

异质性条件下的 经济分析

后起国家对外开放的条件与时机问题

An Analysis in Terms of Heterogeneity: A Study on Conditions and
Opportunit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dapting Opening Door Policy

◎ 曾才生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7112.1
6

**An Analysis in Terms of Heterogeneity: A Study
on Conditions and Opportunit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dapting Opening Door Policy**

异质性条件下的经济分析

——后起国家对外开放的条件与时机问题

曾才生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瑛 王 娟

责任校对：杨 海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董永亭

异质性条件下的经济分析

曾才生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汉德鼎印刷厂印刷

华丰装订厂装订

880 × 1230 32 开 7.5 印张 190000 字

2007 年 12 月第一版 200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6728 - 4 / F · 5989 定价：1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以发展中大国为研究对象，主要讨论后起国家对外开放的条件与时机问题。最重要的创新之处是：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同质性假设，转而采用异质性假设，即假设资本、土地、劳动等要素和产品都存在着数量、质量和种类差异，制度环境是演化可变的，货币的差异表现为预期损失的不同。首先讨论后起国家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与时机问题；其次是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与时机问题；最后从制度环境的变化入手，对当前一些令人困惑的中国经济现象进行了解释。

该书理论不仅挑战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而且解释了令人困惑的中国
经济现象

作者简介

曾才生，湖南耒阳人。经济学博士，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曾供职于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一节 选题目的和意义 / 1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6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思路 / 15

第二章 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异质性 / 17

第一节 产品的“质量阶梯”和多样化种类 / 17

第二节 资本的异质性 / 24

第三节 土地的差异 / 28

第四节 人力资本的异质性 / 30

第五节 企业知本与能力的异质性 / 35

第六节 政府及其制度的异质性 / 43

第七节 制度环境的激励偏向与人力资本的生产性
使用效率 / 50

第三章 总供求的异质性结构差异 / 64

第一节 总供给的异质性结构 / 64

第二节 总需求的异质性结构 / 71

第三节 总供求的异质性结构差异与对外贸易 / 80

第四节 非贸易品存在下的资源转移 / 87

第四章 有效供需缺口及其解决途径	/ 92
第一节 有效供需缺口与凯恩斯主义	/ 92
第二节 剩余的出路与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 97
第五章 货币的异质性	/ 105
第一节 货币的损失函数	/ 105
第二节 货币竞争与货币的历史演变	/ 112
第六章 货币异质性变化的影响	/ 133
第一节 货币异质性变化对债券期限的影响	/ 133
第二节 货币异质性变化对实际货币总余额的影响	/ 147
第七章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风波	/ 161
第一节 金融自由化与货币实际余额的需求变化	/ 162
第二节 临界点理论	/ 178
第三节 预期不变的前提条件	/ 183
第四节 金融自由化实践的后果	/ 186
第五节 金融全面开放的条件与时机	/ 190
第八章 中国经济现象解释	/ 193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象	/ 193
第二节 关于中国制度环境转变的假设	/ 200
第三节 中国经济现象解释	/ 207
第九章 结论	/ 219
参考文献	/ 220
后记	/ 231
致谢	/ 232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目的和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能力。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问世以来，已经获得了长足进展。然而，理论的产生总是源于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也会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在“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当今世界，同样存在着诸多用现有理论难以解答的经济现象。

一般理论认为，贸易开放能够给所有国家带来福利，或者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许多国家也在贸易开放中获益匪浅，典型例子是近年来的新兴市场国家。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在所有时期都对贸易开放持欢迎态度。比如，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在战后的贸易开放中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为此，劳尔·普雷维施（Raul Prebisch）等人强调国际贸易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欧文·克拉维斯（I. Kravis）则认为贸易只是增长的“侍女”（张培刚，1992）。又如，日本在贸易开放中完成了工业化，到20世纪90年代，却与美国发生了贸易摩擦，新贸易保护主义也随之兴起。那么，贸易开放在何

种条件下才能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后起国家（特别是大国），其对外贸易关系在动态过程中又将如何变化呢？过去中国几十年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贸易开放，许多国家对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也持欢迎态度。然而，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完成，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却在不断增多，并且呈现出日益加剧的势头。这种对外贸易关系的变化又如何解释呢？

在国际金融领域，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研究了货币区理论和提出了“三难选择”原则，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研究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秩序，不少经济学家对汇率制度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相对于贸易开放，理论对金融开放的支持远不是那么有力。尽管如此，20 世纪下半期以来，许多国家还是全面推行了金融自由化政策，只是政策的结果各不相同而已。有的国家经历了较大的甚至是很严重的金融动荡，并且经济因此而遭受重创，如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等；有的国家却能够平稳过渡或安然无恙，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就是在那些同样发生了金融危机的国家中，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为资本抽逃，如东南亚各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另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却表现为资本涌入，如日本和德国。更进一步来讲，表现为资本抽逃的都是发展中国家，而表现为资本涌入的都是发达国家。为什么会是这样？金融全面对外开放在什么条件和时机下实行比较恰当？在动态过程中，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后起国家，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金融问题呢？

自 1978 年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以其独特的姿态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在没有发生剧烈制度变革的情况下，中国已经保持了近 30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并且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存在着一些用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

不管是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还是从已有的理论来看，一般认为，自由贸易条件下，小国的外贸依存度应该比较高，大国的外贸依存度应该比较低才是。这是因为：小国一方面受资源总量限制，

为了实现规模经济，有必要把资源集中起来，用于少数行业或产品的生产，不具备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的条件。另一方面又因为国内市场对单一产品的需求有限，本国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无法完全在国内实现销售。因此，小国必须通过产品和原材料的大进大出来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和国民收入最大化，其外贸依存度往往很高。而大国一般具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比较容易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许多行业达到规模经济。同时，大国人口多，潜在的国内市场容量大，无需依赖对外贸易来解决大部分产品的出路问题。因此，大国较低的外贸依存度应该是理所当然（张培刚，2001）。

可是，2004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就已经达到了70%（2006年更是超过80%）。这一数字不仅高于当年的世界平均水平（45.6%），而且远远高于同属资源和人口大国的印度（25%）、巴西（26.8%）等国家。俄罗斯由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出口依存度31.5%，进口依存度16.5%），其外贸依存度相对较高（48%），但也远低于中国。另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中国许多出口产品的产业集中度远低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这更说明了，中国的产品出口并不是源于规模经济。那么，用资源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能否解释这种现象呢？当然不能。首先，资源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仅属于供给层面分析，它们或许能够说明中国生产并出口低档产品的事实，但如果我们反问一下，中国有这么多人口，为什么不能大量地购买并消费本国生产的低档产品，却还要大量地进口外国的高档产品（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奢侈品进口国家）呢？其次，就算资源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中国出口低档产品和进口高档产品的事实，它们也无法解释，何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会远远高于世界上所有其他资源和人口大国的外贸依存度？

二、经典理论的不足

对于上述这些重要的经济现象或问题，经典理论并不能提出让人满意的解释。事实上，经典理论的日益精细化发展，早已显示了解释能力的局限性。究其原因，是经典理论采用了同质性假设。同质性假设虽然方便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但却给理论发展设置了障碍。举例来讲，经典理论存在着如下方面的缺陷或不足：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常假定制度是已知的、既定的，然后在这个已知的、既定的制度前提下对经济总量进行分析。事实上，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各层次生产要素所面临的生产性激励程度不尽相同，它们的产出效率也具有差异。特别是，在一种制度环境下，低层次要素的生产性激励程度可能大于高层次要素的生产性激励程度，而在另一种制度环境下则相反，低层次要素的生产性激励程度可能小于高层次要素的生产性激励程度。由此，制度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宏观经济表现的变化。结果可想而知，对于那些正在发生制度变革或转型国家中出现的一些宏观经济现象，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不一定能够很好地做出解释。

在经典理论中，宏观平衡仅需要考虑总供求数量相等，应对经济失衡的办法也只是从数量上考虑，但却忽视了总供求的异质性结构缺口。在一个同时存在着高层次产品供给相对不足和低层次产品供给相对过剩的国家里（中国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显然，仅仅追求总供求数量平衡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又如货币理论方面，在经典的货币市场均衡模型 $P = M^d / L(R, Y)$ 中，若其他情况不变，物价水平 P 下降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原因是，依据同质性假设，经济增长仅仅表现为产品的供应数量增加而已（产品的质量 and 种类都不变）。但是，假如经济增长不是表现为产品供应数量增加，纯粹只是产品的异质性结构升级（产品的数量不变），那么，物价水平 P 下降就不会是经济增长的必然

结果。由此可见,名义货币供应量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时物价水平 P 下降的程度,将取决于产品供应数量增加与其异质性结构升级之间的偏向。

再比如说,真实汇率被定义为:一国商品和劳务基准篮子与外国商品和劳务基准篮子之间的相对价格。它的另一种说法是,经过名义汇率调整的一国与外国之间物价水平的比率。用公式可以表示成: $e = EP_f/P_d$, 其中 E 为用直接法表示的名义汇率, P_d 为国内一般物价水平, P_f 为外国一般物价水平。如果采用异质性假设,那么,由于欠发达国家基准篮子里的东西大多是低层次产品,而发达国家基准篮子里的东西更多是高层次产品,所以,欠发达国家基准篮子的相对价格理应较低,或者说,欠发达国家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小于发达国家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进一步来讲,在动态过程中,如果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其基准篮子里东西的变化(异质性结构升级)速度应该快于发达国家,随之,前者的相对价格理应上升(假使其他条件相同,这一点很重要),或者说,欠发达国家货币实际升值。本来,这些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道理。然而,由于新古典经济学采用了同质性假设条件,专家们使用一些数学模型来进行推理和论证,其过程难免复杂而又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比如“人民币实际汇率之谜”)。

三、目的和意义

本书以“异质性条件下的经济分析——后起国家对外开放的条件与时机问题”为标题,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对上述各种经济现象进行解释。本书试图放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同质性假设,转而采用异质性假设条件来作为理论分析的基础,即不仅假设产品和资本、土地、劳动等要素具有异质性,而且货币也具有异质性,还将制度环境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引入了生产函数。在分析工具上,不再简单地使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而是用其与产品的质量阶梯和多

样化谱线围成的面积，来讨论异质性假设下的经济问题。如此一来，文章不仅对过去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而且有可能开发出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

第二节 文献回顾

一、关于异质性假设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中，商品和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通常被假定为同质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得问题显得简单明了。比如，消费支出的增加意味着更多数量的同质商品被购买和消费，生产率的提高则意味着同样的投入可以生产出更多数量的同质产品。但是，同质性假设在经济分析中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它像一层坚冰一样，掩盖了存在于真实世界的许多重要问题，并且阻碍了我们对经济规律做进一步深入探索。可喜的是，这层坚冰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正在被逐步打破。事情发端于新增长理论，在分解索洛（R. M. Solow, 1991）的剩余时，丹尼森和乔根森（D. W. Jorgenson）（1987）将资本质量和劳动质量的改进引入了技术进步的内涵中；斯托基（Stokey, 1988）的增长模型中有无数种产品，这些产品被按质量由低到高排列，直至无穷；格罗斯曼（G. M.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 Helpman）不仅建立了产品品种增加模型和产品质量升级模型（1991a），还提出了商品的“质量阶梯”概念（1991b）；舒尔茨（Schultz, T. W., 2002）在农业经济学研究中对人口质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可见，异质性假设是我们理解经济发展和动态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条件。遗憾的是，在新古典世界里，由于同质性假设，许多重要的问题都被掩盖了。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经济学经典著作并不缺乏对商品和要素

异质性的描述。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马歇尔和马克思，劳动被分为熟练劳动和不熟练劳动，地租则因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而异。在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中，伯尔蒂尔·奥林（Bertil Ohlin, 1986）将劳动和资本做了较为细致的划分。舒尔茨（2002, p. 24）指出：“在经济学中早就提出了有关质量的概念。土地的原始性能在质量上的差别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的基本内容。耕地的质量，特别是其产出能力，通常能靠投资得以改善。一般地说，各种生产要素，以及人们所生产出来的不同商品及服务的差异，主要是在质量方面。”然而，早期的经济学家对商品和要素的异质性往往只是停留在描述上，一旦进入经济问题的实质性分析，尤其是在宏观领域，这种异质性就被同质性假设所取代了。由于先驱们的这种习惯和数学方法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应用，致使同质性假设在后来的新古典宏观微观经济分析中大行其道。因为大家容易想象得到，如果一开始就引入异质性假设，数学方法将很难在经济学分析中像今天这样被广泛地采用。

二、关于产品和要素的异质性

营销战略大师米尔顿·科特勒（Kotler, 2003, pp. 454 - 456）认为：产品是能够提供给市场以满足需要和欲望的任何东西。产品有五个层次，每个层次都增加了更多的顾客价值^①。它们依次是核心利益、基础产品、期望产品、附加产品和潜在产品。科特勒补充说：今天发达国家的竞争主要在附加产品层次，而欠发达国家的竞争主要在期望产品层次。用另外一位营销学大师李维特的话来说：新竞争并不在于各家公司在其工厂中生产什么，而在于工厂以外它们增加

① 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 2001, pp. 57 - 58）讲道：“有一个对于判断财货的经济性质极为重要的情况，还希望读者注意，这就是关于财货品质之差异的情况……在一种财货的支配量中，若某一部分量比其他部分量多一些优点，而前者又能更好地或更完全地满足人类欲望时，则具有较高品质的部分量，自然就取得经济的性质”。

的形式,诸如包装、服务、广告、客户咨询、融资、送货安排、仓储以及人们所重视的其他价值。后者与张伯伦(E. H. Chamberlin, 1958, pp. 112 - 124)对“销售成本”的定义具有相当的类似。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怀疑这些工厂外的其他价值了。马歇尔认为贸易和运输是生产的,它们改变了产品的外部关系。贝克尔(G. S. Becker, 2000)则专门研究了广告的价值。

资本的异质性既有货物性的,又有货币性的^①。约翰·希克斯(J. Hicks, 1965, p. 35)告诫我们:这种资本同质性的假定是资本理论的灾难。舒尔茨(1990, p. 47)似乎更关注资本的货物性差别,他说:“更糟糕的仍然是有关基本的资本理论以及各种增长模式的资本聚集方面的错误假设,即认为资本都是同质的。事实上,不仅在农业生产中,而且在所有其他生产活动中,每一种资本形式都具有其特定的性状,它可能是一座建筑物,一台拖拉机,一种特殊型号的化肥,一眼井或者许多其他形式。”在论及不同的资本要素时,伯尔蒂尔·奥林(1986, pp. 61 - 66)曾经讲道:“一定数量的资本可在一个较短或较长的时期内获得,这种期限的不同将影响到资本的使用,因为即使能连续地借入短期贷款,也不能完全弥补在很短时间借出的资本。资本家的‘等待’可以说是不同性质的,如果他有权以短期通知而停止贷款,而不是允许等待一定的时期的话”。“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必须把‘短期’资本和‘长期’资本看作不同的生产要素,以此来识别它们之间的这种区别”。除此以外,他还认为:用于有风险的投资和仅用于安全投资的作用不同,因此将它们按不同生产要素来对待是有益的,即“长期和短期资本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安全’投资资本和‘冒风险’的投资资本”。

张培刚(2001)认为,土地的差异必须根据其用途的不同来划

^① 克拉克教授曾经提出区别纯粹资本与资本货物的建议(Alfred Marshall, 1964, p. 93);伯尔蒂尔·奥林(1986)认为,“资本流动性”应该是指抽象资本,而不是资本货物。前者也就是克拉克教授所谓的纯粹资本,或者说本书所指的货币性资本。他还指出国际上不完全的资本流动性是因为资本家喜欢在国内投资,而不是因为资本货物流动困难。

分。土地不仅具有农业生产用途,而且具有工业生产用途,后者主要包括对航海者所提供的服务,对于开矿者的用途,还有一部分(虽然这种选择是人类而不是自然做出的)是对建筑者的用途。土地肥力不同是决定农业用地质量差别的主要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跟人类的活动相关。马歇尔(1964, p. 165)讲道:古老国家里大部分土壤的性质非常得力于人类的活动;刚好在地面之下的一切土壤,其中有很大的资本因素——人类过去劳动的产物。被李嘉图归入土壤之“固有的”和“不灭的”特性一类中的那些自然的赠与,已经大有改变了;一部分由于人类世代代的操作而荒瘠;另一部分则因而肥沃了。舒尔茨(2001, pp. 79-80)认为农业用地的生产率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土地改良投资等人为因素决定的。除了土地的肥力以外,离中心市场距离的远近也是影响农业用地差异的一个因素,因为有不少高品质的农产品不宜作远距离运输。这方面的理论贡献首推屠能在其《孤立国同农业及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对农业布局的论述。

人力资本在国民财富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94, p. 12)所言:“在所有的社会中,主要的资源是人的生产能力,或如其最终被称呼的人力资本”。弗里德里克·哈比森(Frederick Harbison, 1964)则认为:人力资本构成了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1966, 1971)对西方国家进行了相当长时期的考察,结果发现其国民收入中劳动的贡献从大约55%上升到了75%。在早期的经济学家中,马歇尔是对人力资本论述得最多的一位^①,他认为“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之后,伯尔蒂尔·奥林在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中论及了劳动力的差异,贝克尔和舒尔茨则对人口质量和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贝克尔(1987, p. 38)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量最终取决于工资水

^① 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第四篇(论生产要素)一共分十三章,其中有三章(4、5、6)专门用来论述人力资本,另有五章(8~12)谈论到了人力资本。

平。舒尔茨（1990，p. 16）在农业经济学中通过对人口质量进行研究指出：“虽然，在现有的劳动者既缺乏技术又缺乏知识的条件下，通过增加常规资本，也能够获取某些增长，但是，增长率则肯定是十分有限的。离开大量的人力投资，要取得现代农业的成果和达到现代工业的富足程度是完全不可能的”。

人力资本是由于对人进行投资而形成的。正如舒尔茨（2002，pp. 24 - 25）所讲：“我们将把各种后天获得的、有价值的，并且能够借助适当的投资而增长的人口质量因素视为人力资本。”为了排除人类先天性才能的差异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他假定所有国家的大多数人先天所具有的才能均相类似。张培刚（2001，p. 351）认为：人力资本通常被定义为人类所拥有的知识和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它的范畴主要有两个方面：（1）个人的寿命、力量强度、耐久力和精力；（2）个人的生产能力和技能。贝克尔的家庭生产函数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既可以用来生产市场产品，又可以用来生产家庭产品^①。寻租理论则认为，人类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家庭之外或市场）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性的、增进社会福利的活动，人称寻利；另一类是非生产性的、有损于社会福利的活动，人称寻租，或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寻租理论的基本概念现已逐渐被引入到其他领域，它已经超越经济学，进入到了政治学、东方文化研究和社会学（Gorden Tullock，1999，p. 27）。

三、关于企业的异质性

在新古典主义传统中，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是完全理性的，拥有完全的知识和预见，企业是概念化的、充分有效率的

^① 家庭产品（Becker，1993，p. 153）是指健康、声望和肉体快乐等。贝克尔写道：“迄今为止的假定是，人力资本的增加只直接改变市场上时间的生产力。然而，人力资本或许也能改变用于生产家庭消费或用于生产增加的人力资本本身的时间与产品的生产力。……另一种方法是假定人力资本‘改变’家庭生产函数。”